

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

评《红楼梦》

洪广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37 2827 0

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

——评《红楼梦》

洪广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北京

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字数 15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1}{4}$ 插图 5

197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7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217 定价 0.62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序 言	1
一 贵族地主统治下的黑暗王国	16
二 建立在白骨堆上的富贵繁华	37
三 封建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和腐败没落	56
四 大观园里奴隶们的反抗斗争	75
五 对反动的儒家思想的尖锐批判	96
六 贾宝玉、林黛玉悲剧的阶级实质	127
七 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147
八 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	167
九 二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的斗争	187
十 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	211
后 记	224

序 言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一部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

《红楼梦》出现在清代乾隆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激烈斗争的产物。

曹雪芹的时代，是清代康、雍、乾的时代。他的生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①，大约上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1644 年建于北京）七十来年。他的卒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大约下距太平天国（1853 年建于南京）八十多年。也就是说，曹雪芹的时代，恰好是处于两次农民大起义的高潮中间。

康、雍、乾的时代，是清王朝封建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特别是康熙执政六十一年，在历史上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他在政治和军事上，消灭了分裂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打击了觊觎我国的殖民主义势力和侵略者，巩固了祖国的版图；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例如兴修水利等，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多少封建史学家也讴歌这个时代是什么“康、乾盛世”。然而，封建社会究竟已经到了它的末期，当时社会阶级矛盾还是十分尖锐的。引起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社会矛盾，清代统治者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解决；相反，这些矛盾还在进一步发展

① 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请参看本书《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中的叙述。

并日益激化起来。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期间，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人口也有了急剧的增长。但是，在同一时期里，官僚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也在剧烈地进行。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更多的农民丧失土地，流于赤贫。

在大官僚地主阶级疯狂地掠夺土地的情形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唐甄说：

数十年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妻去其夫，子离其父，常叹其生之不犬马若也。^①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是四空也。

.....

吴中之民，多鬻(yù，音玉，卖的意思)男女于远方；男之美者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穷困如是，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②

唐甄死于康熙四十三年，他所揭露的事实，正是当时剧烈的土地兼并的结果。上面这些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大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是多么尖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王朝建立以来，各种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即曹雪芹的晚年，农民的反抗斗争已经遍及全国各主要地区，而这正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奏。曹雪芹死后十来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爆发了山东王伦的起义。

① 《潜书·富民篇》。

② 《潜书·存言篇》。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①。毛主席指示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是我们研究所有以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指针，是我们衡量各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性质的一个准则，同样也是我们评价《红楼梦》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②。我们知道，清代封建王朝，已经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其所以是末期，从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状况来说，当时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到清代康、雍、乾的时期，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封建生产关系之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充分暴露；从它的外部世界来说，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开始寻找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商品已经在猛烈地敲打着古老中国的大门，而且即将继之以大炮和军舰。

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乾隆时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它的发展虽然是不平衡的，并且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全貌来看，封建经济仍然是占主要地位，然而，它毕竟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了。据史料，在当时的丝织业、棉纺业、制瓷业、冶铁业中，都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或手工业工场，商业资本

①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下同）第589页。

已经开始渗入手工业生产。而在矿业方面，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①的万人以上的矿场。在农业方面，也出现了商业性的农业和园艺业。以丝织业论，当时江宁、杭州、湖州、苏州等地，民间的丝织业机房，为数就不算少。据一些史料记载，江宁在乾、嘉年间就有私营的织缎机三万余张。^②

当时的经营方式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种是手工业工场主雇用工人在自己开设的工场里进行生产。另一种是除在自己的工场里进行生产外，还把生产的任务交到其他的小作坊去，也就是还控制着其他小作坊的生产。第三种是把生产原料（丝经）散发给机户，由机户织成后领取计件工资。

晚清陈作霖在《凤麓小志》里讲到乾隆时江宁的丝织情况时说：

金陵机业聚于城之西南隅。开机之家，总会计处谓之账房，机户谓之代料，织成送缎，主人校其良窳（kǔ，音苦，坏的意思），谓之讎货。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各机户复将丝发交染坊染色，然后收回，织成缎匹，再售与绸缎业。四者层层相因，休戚相关。清乾隆迄今，通城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织机之工俗呼机包子。

这里所讲的丝织情况，大致是属于二、三两类，同时也反映了商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一部分手工业作坊“组织”起来了。这个材料里提到的被呼为“机包子”的“织机之工”，自然就是指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手工业工人。

① 《皇朝经世文编》田畴：《陈粤西矿厂疏》。

②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

我们再看看当时苏州的情况,《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织工部》《纪事》门说:

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

这个材料不仅说明了当时丝织的分工很细,已经“各有专能”,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织工们出卖劳动力的劳动市场的情况。这一批“衣食无所”,“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的“缎工”、“车匠”,无疑就是上文引到的被“俗呼”为“机包子”的“织机之工”。那末,与这些“缎工”、“车匠”对立地存在的自然还有雇用这些“缎工”、“车匠”的“机户”,即手工业作坊主及手工业工场主等等。康熙五十一年(1712)巡抚郎廷极请以曹寅之子继任江宁织造的奏折中说:“今有江宁省会士民周文贞等,机户经纪王聘等,经纬行车户项子宁等,缎纱等项匠役蒋子宁等,丝行王楷如等,机户张恭生等,浙江杭嘉湖丝商邵鸣皋等,纷纷在奴才公馆环绕,具呈称颂曹寅善政多端。”这里所说的“省会士民”(城市知识分子)、“机户经纪”、“车户”、“丝行”、“丝商”等等,无疑都是当时的手工业作坊、手工业工场的主人、经纪人和商人。正是上述这些人:手工业工人、手工业作坊主、工场主、经纪人、商人、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居民,在封建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从

上面所引的这些材料里，是可以看到清代康、雍、乾时期市民阶层的某些历史面貌的。

手工业工场的发展，手工业产品的增加，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带来了商品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等。当时的江宁、苏州、杭州、扬州等地，就是手工业、商业比较繁荣，人口比较稠密，交通也比较发达的大城市。

随着新的手工业、商业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自然在封建社会内部又增加了一种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力量，从而在封建社会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这一主要矛盾之外，又增加了一重新的矛盾，即市民阶层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历史上，自明代后期以来，一直到清代后期，市民阶层的斗争，即市民运动，从未间断过。例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在奏折里就向康熙报告“江宁、镇江、扬州等府百姓”因为拒绝新督抚而于“二月十八、十九等日连日罢市”。^①在当时的江宁、苏州、杭州、福州、广州等地都曾发生过商民闹衙的斗争。到了乾隆时期，苏州和杭州也先后出现商民罢市、拆毁公堂和聚众万人的大示威。特别是乾隆十二年，山西万泉、安邑两县市民的“闹街”运动，连乾隆自己都惊呼：“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者。朕初不信，仍戒饬之，乃福建则有罗日光抗租拒捕之案，山东则有张怀敬聚众殴差之案，江南则有王育英号召罢市之案，广东则有韦秀贞拒捕伤人之案，而莫甚于山西安邑、万泉，聚众抗官，守门索犯之肆为猖獗也。”^②这里，乾隆列举的一系列人民斗争的事件中，就有“江南王育英号召罢市之案”和山西安

① 《苏州织造李煦奏折》第27页。

② 王先谦：《东华录》乾隆十二年。

邑、万泉两地人民“聚众抗官，守门索犯”的斗争，可见当时市民群众斗争的情绪是很高的。

上面所有这些事实，正是封建社会末期这一对新的社会阶级矛盾的反映。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思想的伟大作品。

贯穿于康、雍、乾三朝的另一重矛盾，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围绕着皇位的继承权问题，统治阶级进行了残酷而毒辣的争夺战。雍正上台以后，立即把他的皇位争夺者加上种种罪名，予以消灭。连同他父亲一朝的大臣，只要对他不利的，也不放过。统治集团这种激烈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结果加速了贵族集团的分化，也从内部制造了一批自己的反对者，曹雪芹的家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败落并开始分化的。

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激烈斗争和升降变迁，并不仅仅是影响极其少数的人。黄印《锡金识小录》讲到当时无锡的情况说：“雍正间汇追旧欠，奉行不善，凡系旧家大抵皆破。”所谓“汇追旧欠”，只是一种借口，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斗争。当时以“汇追旧欠”的名目，连远离京师的无锡一地都弄到“凡系旧家大抵皆破”的程度，则可见这股“追旧欠”的“风”波及面是如何之广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地主阶级中一些人的这种荣辱无常、朝荣夕死的情况，在思想上给予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极其深远的影响，促使他们思想上发生分化。有的追求消极避世的佛老思想，少数的人则在进步思潮及其他条件的影响下，转向了积极的方面。伟大作家曹雪芹就是从这个贵族地主阶级里分化出来的。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红楼梦》时代社会阶级矛盾的

一个重要表现。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权，一开始就尊孔尊儒，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统治阶级一方面大力宣扬程朱理学和镇压异端思想；另一方面，又通过科举考试，开博学鸿儒科，纂修明史等等一系列的政治措施，甚而至于大搞文字狱等等，以拉拢、打击和控制知识分子，强化他们的反动思想统治。就这样，统治阶级凭借着他们的政治力量，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掀起了一股与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权相适应的唯心主义反动思潮。

然而，地主阶级的政权既不可能用暴力把人民反抗斗争的烈火扑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决不可能用唯心主义来取代唯物主义，用封建正统思想来消灭反封建正统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正是在清代康、雍、乾的时期，当着唯心主义反动思潮大泛滥的时候，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戴震等等。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程朱理学，对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对科举制度，对土地制度以至于对妇女问题、民生问题等等，提出了猛烈的批判和抨击。他们批判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指斥程朱理学的本质在于“以理杀人”。他们还批判了封建正统的儒家看不起“工商”的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他们还猛烈地攻击八股科举制度，指出这种制度是“败坏人材”。总之，在当时的许多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中，贯彻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现实政治和对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儒家正统思想及唯心主义的批判精神。

《红楼梦》就是在这样激烈的社会阶级斗争（包括市民斗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产生的。在《红

《红楼梦》中也同样反映着激烈的社会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特别是响彻着对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的猛烈批判的声音。

《红楼梦》里有一句名言：“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句话，可以说是清代乾隆王朝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是概括了末期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乾隆王朝就是包围在上述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中的。一方面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另一方面是当时官僚统治阶级的极度贪酷奢靡，土地的高度集中并向农民榨取高额地租，造成了广大农民的极端贫困和破产。这一切反映着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政治已经进入它的“末世”。事实上，乾隆中叶以后，骨子里已经是民穷财尽，但在外表上，还煊赫一时，这就是《红楼梦》的时代的突出的特点。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写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斗争。作者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特别是对贾府这个典型的封建贵族世家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生动地、形象地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画面，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已经衰朽和行将死亡。

作者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和上层建筑（主要是封建的正统思想的各个方面）作了十分深刻的批判。但作者的这种批判，是采取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形式曲折地表达出来的。

作者反复声明此书不过“大旨谈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毫不干涉时世”。实质上，这不过是作者用来掩盖他的作品的政治内容的一种手法而已。

过去的“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枉自翻腾了二百年，恰恰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有的是真正一窍不通，把作品表面的东西当作作者的“本旨”；有的则出于反动目的，对这部作品肆意歪曲，一口咬定《红楼梦》的主旨是“谈情”。胡适、俞平伯更是借此机会，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胡诌起来的“自传”说和“情场忏悔”论、“钗黛合一”论等等，骨子里都是以反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为其基础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周扬一伙的反动文艺路线下，有的同志竟然提出了典型“共名”说，把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典型形象说成是超阶级和超时代的，简直把地主资产阶级一贯鼓吹的所谓“永恒人性”捧上了天，这是《红楼梦》主旨“谈情”说的恶性发展。其实，作者的“本旨”，根本不是什么“谈情”，而是“谈政”，是讲政治斗争。那末，作者为什么采取这种形式？可以说，这倒并非出于作者的“本旨”，这是不得已的。试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如此惨酷，一字违碍，全家流配或抄斩，那么，这部“本旨”实质上在于讲政治斗争的《红楼梦》，岂能不披上一件“谈情”的外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是渴望能在当世和后世得到“解味”的人的，即希望人们能透过“假语村言”看到他隐去的真事。既然惟恐别人不解其“味”，则可知此书的“味”，并不就是作者公开声明的“大旨谈情”，而恰恰就是他用“假语村言”掩盖的政治斗争。如果其“味”就是“谈情”，则这个“味”又有什么难解？值得作者如此深长叹息！

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两个艺术形象出现的时代环境，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生长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历史时期。曹雪芹的父祖辈历任六十年江宁织造，这是管理设在南京的官方丝织手工业工场并控制民间丝织手工业工场的一个专门机构。无论是南

京、苏州、扬州，都是当时有名的手工业、商业城市。作者的早年，是在南方的大城市里生活过的，南方的这种大城市的生活，对于作者的思想是有影响的，更何况作者的后期由于家庭的败落，较多地接触了下层群众的生活，作者的世界观因而又有所发展。这一切自然会给他的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创造的这两个艺术形象本身的叛逆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封建卫道者贾政就一眼看穿了贾宝玉的思想的危险性，是在要弄到“弑父弑君”，这也表明，他们的思想尽管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渣滓，但已经不能说是完全属于封建阶级，因而这两个艺术形象也不能归结为没落的封建阶级的代表。

贾宝玉、林黛玉坚决反对封建科举的“仕途经济”的道路，极力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以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等等的思想，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都是适合正在封建社会母体里孕育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的，他们叛逆思想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是这个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利益之所在，是正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叛逆思想，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有资本主义萌芽）是协调的。否认这一点，则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叛逆思想，就完全失去了现实的土壤。

正是由于作者的“本旨”是在讲政治斗争，因此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上至皇帝、王公贵戚、贵族世家，下至破落地主、城市无赖、市民娼妓、僧道尼姑、贫苦农民，以及世家大族的豪奴恶仆、丫环妾妇，诸色人等，无一不写。如果作者的“本旨”不过是在“谈情”，那末这许多与“情”无关的人和事何为而设？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写出了贵族世家的奴隶们的反抗，并且对于他们的反抗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作者对被压迫阶级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作者在对封建贵族世家作深刻的批判的同时，也还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的叹惋情绪。这一切，都是作者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的反映，这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而应该予以认真的分析批判的。

伟大作家曹雪芹，并没有完成他的不朽巨著，现存脂砚斋评八十回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原著，八十回以后，他也写了一部分，但不幸当时就“迷失”了，现存《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高鹗的续书，在完成贾宝玉、林黛玉的悲剧结局上是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的，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由于高鹗的续书，使一部辗转传抄的《石头记》八十回稿本，成为一部首尾完全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并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以活字版排印出书，从而结束了此书的抄本流传阶段，这对于扩大《红楼梦》的流传，和保持此书前八十回的基本面貌，免受更多的封建卫道者和不负责任的抄手的歪曲删削和破坏，都是有好处的。当然，续作者对前八十回也作了某些删改，在后四十回里又在某些问题上违背了作者的原意，如让宝玉中举和出家成佛，被封为文妙真人，还让贾府复兴，兰桂齐芳等等。如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而终于看出了封建制度的天已经不可补了的话，那末，高鹗恰恰相反，他是尽力想去补这个已经残破不堪的封建制度的“天”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看出了这两位作者的世界观的差异和对封建统治阶级不同的态度。

《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二百年来围绕着对这部书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地主资产阶级的文人们极力掩盖这部书所蕴藏的思想锋芒和批判精神，他们不是把

这部书诬蔑为诲淫诲盗，就是把它说成是一部讲爱情的书，或者说成是宣传“色空”观念或“三教（儒、释、道）合一”思想的书。一九五四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展开了对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派”的反动观点的深刻批判。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一场批判胡适、俞平伯的反动观点的斗争，批判了“新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几十年来所散布的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为我们正确阅读、评价和研究《红楼梦》指引了方向。这场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然，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不会终止。围绕着《红楼梦》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并仍将继续下去，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总之，《红楼梦》是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和概括了广阔的历史